

田野里的大師

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

张冠生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CG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14060684

K825.4

348

张冠生 著

田野里的大師

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北航

01747869

K825.4
348

122000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野里的大师 / 张冠生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10-2083-3

I. ①田… II. ①张… III. ①费孝通 (1910 ~ 2005)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4230号

书 名: 田野里的大师
作 者: 张冠生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镛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王瑞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810毫米 × 1020毫米)
印 张: 8.625
字 数: 113千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083-3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二〇一〇年八月，海豚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海豚书馆”与读者见面，之后我们陆续推出了“海豚文存”“祝勇作品”“独立文丛”“董桥精品系列”“海豚小精装系列”等高品质图书，在业界得到广泛赞誉，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目前，“海豚书馆”已有六十五种，其他丛书也在陆续面世。每套丛书，我们都邀请名家担任策划人和主编，力求荟萃海内外名家优秀作品，展示近现代人文经典著作，以精装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我社从上述精装书中精心挑选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几种图书，重新设计封面，以平装形式出版，价格更加贴近大众的读者。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海豚简装”。这次我们推出《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的简装本，以飨读者。

我的后台梦（代序）

沈昌文

干我们这一行，照出版江湖的办法，最好有个后台。出版这行比较危险，有个后台，比较容易站住脚。那么，我在出版界混了多年，后台是谁呢？

读我的自传，不难想象，我的后台是陈原、范用等出版界前辈。这不假。我追随他们多年，他们称得上是我的后台老板。不过，他们的行政级别都不算高，尤其是算不上中央领导。那怎么办呢？

中央领导人的面我都从来没见过，真是欲求无门。左盼右盼，一直到我的出版生涯的最后几

年，才结识到一位非共产党的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费孝通。

我一直愿意把出版工作办成公众文化事业。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在河南郑州创办了一个“越秀学术讲座”。我请国内各地的学者来郑州讲演，郑州的朋友都很高兴，愿意支持我。越秀酒家的老板崔先生，郑州三联书店主持人薛先生不用说了。我还因此结识了河南文化界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因其中冠生兄的举荐和协调，我结识了费老，请他来郑州讲演好多次。费老那些年正在持续研究中部地区在国家格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问题，经常路过郑州。他是国家领导人，每次来，阵势自然不凡。例如，那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就会接见他。据说，费老经常在接见晤谈时提出一些很有内容的工作建议，颇受省委注意。

费老是社会学家。我这个年龄的人，一听说“社会学家”，心里都会嘣的一跳，而我更甚。我是学苏联经验长大的，从来就接受一个观念：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那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就没

用了。还有一个观念对我影响更大：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我们这里只有光明面而没有阴暗面。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早期，我刚学习做编辑工作。一天，有位潘光旦教授来访，高级编辑不在，由我接待。潘教授带来一大包稿件，是他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希望给他出版。我同潘教授谈得很投机，特别因为他是上海宝山人，那是我的老家，我乘机同他扯了半天家乡话。以后，我看了一些他的译文，发现他结合中国情况加了许多译者注，我十分钦佩。但是，这稿子当年没法出版。你想，解放后，怎么能允许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来翻译革命导师的伟大著作呢？

幸好，到改革开放年代，一切都改变了。在见到费老以前，已经听到传达，一九七九年三月，胡乔木公开为社会学“正名”，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宣告成立，由费孝通教授任会长。这是中国社会学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中断期的终结与重建期的开始。

因这缘故，更因为可以经常见到费老，我就比较关注和阅读费老的论著。在费老的浩繁论著中，最令我心动的是他的田野调查。我当年对毛泽东思想心醉神迷，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读了《毛选》的开卷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觉得革命领袖当年真是不辞劳苦，对中国社会作这么认真的调查研究。读了费著，觉得这位前辈这方面的辛勤劳作可说不让共产党内的大人物。尤其是，后来听费老说起，他做这些调查，简直到了出生入死的境地。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费孝通和夫人王同惠在国内边远地区做调查，山路极其曲折险峻，以致他们走迷了路。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起立。王同惠赶紧出林呼援。但她从此一去不返，第七天才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遗体。这时距她与费孝通结婚之期才一百零八天。

从这开始，我当然更想请求费老做我这小出版商的后台。但是好景不常：郑州的学术思想界

发生了一些新情况，越秀学术讲座不办了，同费老见面的机会少了。我不死心，还想在北京重启炉灶。这个主意北京学术界都很赞同，尤其是李慎之。他特别认为我找费老这“后台”找得好。费老本人也同意用他的名义举办活动。他老人家在那时经常用英语对我说：对我们老人说来，mental exercise 比 physical exercise 更重要。可见他的态度。可惜，北京的活动，只举办了两三次就停了。原因在何，也不去细说。也正好，我本人这时也正好到了该停止一切活动的年龄，应当回家去一个人做种种 exercise 了。

现在回顾起来，费老在我出版生涯的最后阶段圆了我的一段“后台梦”，是我永远难忘的。

如今，冠生兄从他长年为费老当助手的勤勉记录中整理出一些史料，为读者提供我的“后台”调研、治学过程中的后台工作现场实况。我乐见其成，也由此更多了解、理解了费老。史料难得，诸君可闲中一读。

二〇一三年七月

田野和大师

王 赞

费孝通一直是一个 Grand Nom。自然，应将这个法文词翻译成“大师”，我却无意中发现，字面的翻译“大名”能更好描述我之前对费孝通的认识：鼎鼎大名之外，我对这位学界泰斗却所知无多。《田野里的大师》让我从学术和生活片段中还原出一个鲜活的形象：原本风趣、乐天、学识渊博、做无拘束思考的灵魂，又被某种责任感“拘束”在社会和社会学这块田野里。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都从他那里受惠良多，整整一代社会学家，要么直接受其教诲，要么将自己的研究多少打上了他的印记，而江浙乡镇企业、小城镇、区

域发展、文化自觉等重要命题也都与他有脱不开的关系。那么，一篇有感而论、以论代感的读后感或许是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不是空泛的对其“名”的直白表达，而是就其“名”背后的思想、实践进行讨论、辨析。如此，“大名”方成为“大师”，而“费孝通”这个符号才如社会学意义上的符号一样，有了“名”之外的载体和认识意义。

《田野里的大师》因此显出了它的意义。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片段性的细节想象一个属于自己的“费孝通”。这个想象既不脱离原型又是对原型的再加工。同时，这个形象不是外在强加，而是从每个头脑中产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每个头脑自己的认识。在这种若即若离、亦即亦离的状态下，我们或可求得一个最真实的“费孝通”符号。这个符号的真实性并不在于对符号做精确定义，而在于符号和我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关联：我们的认识或生活与“费孝通”这个符号所承载的认识或生活相连接，从而超越了时空的隔绝。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代一代的学者不可逆转地归于了过去。这样一本“日志小传”却润物无声

地将“过去”与现在的我们联系了起来，并引发了（着）我们的思考。柏格森认为生命就是“绵延”。诚然，正是在生命中，人与自然相联系而赋予了“生活”以“绵延”的特质。所有与人相关的科学也因此有了认识和学科上的意义：这些科学本就是关于人和人的生活认识体系。而正是在生活本身，认识才不成为脱离实践的空泛之物。或者说，认识和实践交汇于生活。那么《田野里的大师》真实体现了这样的联系。无论是温州、苏南、上海还是京九线抑或深圳，社会调研实践本身即是认识的过程。同样，收录的谈话或访谈也不是高座空谈，而预先就被给定了实践意义。

社会科学中的任何认识必是立足于实践展开并最终回归实践。区别于自然科学“先解决分歧再开展研究以求达到真实”的模式，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模式应该是“在分歧中开展研究，使认识和实践在生活中达到美好”。

社会科学的伦理学意义正在于此。它用自身的发展教会我们在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又是应该避免的。如果自然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

那么社会科学的价值则相对在于求善，而《田野里的大师》从实践和认识两方面呈现了费孝通的求善之路。

实践方面，面对各地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同，考察必须尊重并注重持续存在的差异性，而我们却很容易从中发现了一个共性：在关注差异之外，费孝通所作的区域发展调研始终服务于一个固定的目标，即当地民众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由于发展的差异，具体的措施当然会有不同。在江浙可能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中部地区则是由铁路枢纽带动的“链式经济生态环境”；在上海主要解决深水港的问题，在河南则是搞“公司加农户”。但“立足民生、发展生产”这样一个目的却超越了具体的环境限制，做到了贯穿始终。

认识方面，书中依托《起草文章》、《吴江谈话》、《深圳访谈》等章节详细介绍了费孝通的认识体系，并解析了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而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发现类似的人文主义目的。无论是“定义好的社会”，“解释人类学的形成”还是“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孝通的研究志向一直以

生活为本，以原创为本。齐美尔在《为了艺术的艺术》一文中讽刺了十九世纪流行的“艺术为了艺术，生活为了生活”的观点，并提出“艺术为了生活，生活为了艺术”。我们不妨套用这句话作为对费孝通学术认识的概括：“学术为了生活，生活为了学术。”

这是以对善的追寻作为伦理学目标目的，同时联系起认识和实践。换句话说，“知行合一”。如此，则无须去苛求“知”和“行”的顺序问题，因为在“善”这个目的之下，“知”与“行”并不互斥，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如何定义善反倒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否回归到传统道德中去？还是完全摒弃传统道德的约束，去建立一套新的伦理体系？一副对联完美刻画出传统道德要求下的中国人形象：“一种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如以此为标尺，费孝通则似大大背离了传统。无论待己还是待人，在读书耕田之外，他孜孜以求的是让生活脱离传统状态，尽量融入现代社会。一边是通过发展互助、“1.5产业”等途径使民众摆脱经济困顿，进

而达到文化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复苏和活跃，一边是为这个目的而倾注心血，于学中求，于求中学。两者显然都超越了“读书耕田”所限定的道德要求。但同时，这两者又显然不是建立在否定本土文化和身份认同之上。这才给“文化自觉”留了可能。

我们所强调的善和作为社会强制力的道德因此并不完全对应。在机械性的道德之外，一种基于生活本身的伦理才是善的深层意义。换句话说，善蕴含于生活本身，而生活才是所有人和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谋求区域发展是为了这个善，开展社会学研究也是为了同一目标。反过来，这个善同时给发展实践或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和目的。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是，这种以生活为本的“知行合一”经常被今天的学界和政界所忽视。治学上，现今的社会学领域里有大量格式化“科学”，却缺乏对学科目的进行思考的学术成果。同样，追求统计学意义上的高效至少部分地导致了“经济发展，生活越困顿”的局面。是否应该反思这个问题？费孝通的实践和认识直接给我们提供了这

两方面的答案。

自《江村经济》开始，费孝通在人类学范围内格外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这种学术倾向在80年代之后其参与的各项社会调研中清晰可见。《田野里的大师》也据实收录了费孝通关于区域发展的思考过程和具体意见，难能可贵。在费孝通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后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无疑是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与之相对应，“志在富民”把握了时代呼唤。这个呼唤并不是某个超有机体的诉求或某种“法则”使然。回归到社会中，“求富”实实在在是当时民众的普遍愿望。对经济的关注因此并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背后是在给定时代特点下对社会整体性的细致把握。不妨做个设想，一种情况是以长江为轴，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京九线串起了糖葫芦，淮海和中原经济区托起黄河流域，东北依托俄罗斯，西北依托内陆贸易。另一种情况是有若干特大城市，却对周边缺少辐射作用，城乡差别不单存在于经济层面，同时存在于社会生活乃至思维模式各个层面，国家总体呈现阶梯式的“集欧亚非于一身”，一边是

高生活成本导致的逃离北上广，另一边是价值冲突导致的逃回北上广。哪种情况下的社会更令人向往呢？《田野里的大师》中就藏有费孝通给出的答案。他对经济的关注并不排斥对其他社会层面的关注；相反，经济被当作桥梁或突破口，以此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革新。参照韦伯对行动所做的划分，我们发现，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方式，而多元多维度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

据此，若将费孝通看作经济决定论者则是彻底的误读。作为内部世界整体的人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处在不断的往复中，人在内化他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外化他的内部世界。如此一个过程造成了同时发生、看似冲突却相辅相成的结果：人被外部世界塑造，反过来又塑造了这个外部世界。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联系了“自我”和“他者”，社会因此得以可能。经济是塑造这个“不断的往复”的一个方面。而对社会的理解也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及经济和人关系的正确理解之上。

对经济和人关系最荒谬的误读就是将经济